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机制及主要经验

贾 颖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动员生产和改善社会风尚,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劳动模范选树工作。党和边区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深入调查、劳动竞赛、群众推选等方式,使劳动模范在生产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借助会议、报刊与文艺宣传等方式使其获得广泛认同,形成了独特的劳动模范选树机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注重宣传与教育相结合、弘扬劳模精神,为新时代开展劳动模范选树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劳动模范;典型选树;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9.5;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3-0009-10

收稿日期: 2026-02-10

作者简介: 贾 颖(1998-),女,山西大同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3.016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劳动模范选树始终是推进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李富春曾谈到,“我们必需了解,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发现、培育模范工作者与劳动英雄是发扬革命队伍中每个人一技之长,每个人的创造性,把各方面工作推向前进的重要办法。”^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选树是由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发起,旨在摆脱经济困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转变群众的劳动观念,改善当地社会风尚的一种新型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学界从不同角度关注了这一时期的劳动模范运动与典型人物,但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侧重分析其形成背景及实际成效^②,而非劳动模范选树的运行逻辑。基于此,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劳动模范的产生、确认与推广过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劳动模范选树的具体运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期劳动模范选树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双重压力下,陕甘宁边区军民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党和边区政府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密切党群关系,转变陈旧观念以及加强社会治理,开展了一系列劳动模范选树工作。

(一)摆脱日益加重的经济困难

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加之,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抗战和革命的特殊环境之中,边区经济极为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粮食产量下降。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中北部,丘陵居多,大部分农田都在山坡;气候多变,水土冲刷严重,地力易减,土壤贫瘠,耕种困难;旱、涝、虫、雹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第二,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林伯渠在《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中指出:“在顽固分子及日寇封锁下,经济工作要有些斗

^①《准备迎接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解放日报》,1944年9月1日,第1版。

^②孙云:《延安时期劳动模范表彰运动的实际功效——以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及影响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王彩霞:《延安时期“英雄”角色的置换——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与劳动模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王明生、董颖鑫:《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运动的政治分析》,《学海》2010年第5期;等等。

争,封锁是开展工作的第一个障碍,技术与劳动力的缺乏,在经济建设上是严重的事。”^①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农民使用锄、镰刀、耢头等简单工具,耕作方式除部分地区较好之外,大都以粗放式耕种为主,尤其是农民多用开荒丢荒的方法生产,缺乏系统的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力低下。第三,脱产人员增加,政府财政紧张。陕甘宁边区建立后,许多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投身边区参加革命,边区的党政机关和学校不断壮大,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也随即增多,“1939年四万九千人,1940年六万一千人,1941年七万三千人,支出随之大幅度增长”^②,使得生产与脱产人员比例失调。此外,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导致粮食供需失衡,加重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人民生活贫苦不堪。

面对自然条件严酷、生产技术落后等多重不利因素,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树立劳动模范,借助先进分子推广生产经验,动员群众投入生产,以缓解财政压力,巩固革命根据地。

(二)巩固党在边区的执政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的诱降和拉拢下,国民党开始实行反共政策。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的一切经费,同时切断棉花、布匹、铁矿等必需品的供应。中国共产党在外援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多次动员边区人民主动上交救国公粮,“以这救国公粮来借给政府机关与抗战部队,免得需要粮食时临时由群众捐助、借粮与零买”^③。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由1937年的一万四千石激增到1941年的二十万石,这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二点八,增加了十多倍”^④,随着救国公粮征收数额的增加,人民的负担也逐渐加重。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道,“在中央政府停发经费后,边区的部队不得不由边区人民给以适当供给了。加以友区的封锁,今年边区人民的负担无疑的是比前数年加重了。”^⑤在沉重的税收下,边区民众生活日益困窘,生计受到严重威胁。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党群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连年的征收公粮,导致人民生产积极性大大削弱,部分民众存在消极抵抗情绪。1942年,边区银行在总结农贷中提到,农民在今年春初,有不少因为避免公粮负担,互相移动,生产情绪不高。高桥村有六户人家移走,二户移来,所减少的十五头牛中带走了八头。^⑥二是在征粮过程中,部分干部宣传、动员等工作不细致、不到位,未能按上级指示开展工作,甚至还出现以多报少、互相隐瞒征收数量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边区政府在动员群众积极生产的同时,发掘并奖励劳动模范,将其培育为带动生产的重要骨干。由此,劳动模范在党、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即党和政府通过劳动模范推进边区建设与日常治理,群众借助劳动模范表达自身诉求。以劳动模范为中介,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党群关系,巩固了其在边区的执政基础。

(三)转变劳动群众的陈旧观念

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区域,文教事业发展缓慢,普通民众90%以上都是文盲,如陇东华池县在400人中难以找到几个识字的人,在环县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一个县里才能找到两个。^⑦整体而言,边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民众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在劳动观念上,边区群众多将劳动视为维持日常生计、解决基本温饱的手段,缺乏生产主动性,易产生懈怠和应付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动员成效,直接阻碍了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另外,思想陈旧还体现在政治意识较为淡薄。在地主、军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②《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页。

^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01页。

^⑤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史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阀长期剥削的影响下，多数群众民族意识淡薄，国家观念也相对狭隘。加之边区多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①。

为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转变旧有的劳动观念，边区政府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随着劳动模范“热爱劳动、积极生产”的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其先进观念逐渐在边区传播开来，转变了民众的劳动观念，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向劳动模范学习、以劳动为荣的氛围。

（四）改善边区落后的社会风尚

陕甘宁边区社会问题较为突出，迷信、赌博、吸食鸦片及不讲卫生等现象普遍存在。以1936年的延安市为例，全市居民仅4841人，其中烟民达1500人，官办大烟馆5处、赌场15家，另有娼妓54人、巫神60余人。^②上述现象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在客观上制约了边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其一，移民与难民数量激增，妨碍边区社会管理。在战争、灾荒和国民党长期残酷剥削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边区共安置的移民难民约在15万以上。^③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加之移民难民本身具有分散性、不稳定性等，社会问题随之增多，加大了边区政府管理和建设难度。其二，二流子数量庞大，影响边区社会治安。二流子受旧统治阶级寄生生活的影响，长期脱离生产，多依附军阀和土豪劣绅，以游手好闲、拐骗盗窃为生。二流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不劳而食的旧有上层阶级，其轻视劳动，贪图享乐；另一类是被剥夺生存条件而流离失所的普通民众，在吃喝嫖赌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下逐渐成为地痞流氓。据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三千，流氓地痞就接近五百，占人口数的16%。延安县流氓占人口数的5%，如果以延安县的流氓比率数来推算全边区，则一百四十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七万左右，即从低估计革命前全边区有三万流氓分子，当不为过。^④其三，民间陋习广泛存在，阻碍边区社会进步。边区建立之前，童养婚、买卖婚姻等封建婚姻形态较为普遍，男女双方缺乏婚姻自主权，往往听从父母或宗族安排。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视为附属物，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缠足、穿耳等习俗亦屡见不鲜。这些陈规陋习不仅危害群众的身心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边区社会秩序的改善。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选树是解决边区社会问题，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借助劳动模范实现社会整合，组织移民发展生产，实现了边区有效治理；以劳动模范带动社会群体转变，推动了二流子改造；通过树立妇女劳动模范，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二、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的实践机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领域选树了多种类型的劳动模范。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劳动模范选树大体形成了典型的“组织—挖掘—宣传”实践机制。

（一）健全完善劳动模范选树组织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机构是否健全完善、坚强有力关乎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工作的成败。为此，边区建立了一整套由上到下的组织机构，加强对劳动模范选树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使相关工作得以运转高效、规范有序。^⑤

1. 建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②胡民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1页。

^③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④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8页。

^⑤贾颖：《塑造劳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经验（1939—1944）——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1938年4月,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边区总工会章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正式成立。自成立之初,边区工会便把组织和动员群众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领导农业工人并协助农民改善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积极性”,“提高工人劳动热忱,积极参加边区战时经济建设”^①,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在农村,每逢春耕时节,边区工会动员农民参加劳动生产,组织开展劳动互助。农村工人主动缴纳救国公粮,在其带动下,农民积极开荒,如:甘泉县开荒1130亩,每人平均2亩;固临县开荒49.5堆,每人平均7堆,种熟地9874堆;延川县3052亩,每人平均2.65亩,种熟地32334亩。^②另外,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特别注重动员工业工人,激发其生产积极性。1939年以来,总工会在公营工厂中组织劳动竞赛,工业工人生产积极性明显提升,推动了边区工业生产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除动员群众之外,主要贡献还体现在选举和表彰劳动模范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选举是由工会首先倡导并付诸实践的。1940年10月,朱德在考察边区工厂生产状况时,围绕工人队伍建设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首先强调要在工人中“出现许多工程师、技师、专门家和斯达汉诺夫运动者”^③。这一讲话为边区工人生产竞赛与劳动模范评选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随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于次年3月颁布《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和《奖励模范劳动者办法》,并设立专门的竞赛评判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和评议工作。5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五一”生产竞赛总结大会,评选并表彰了270多名劳动模范,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劳动人民。此外,边区总工会还注重通过舆论与典型示范扩大劳动模范的社会影响。1942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对其生产经验和劳动表现加以集中宣传。10月,边区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工厂组织工人开展学习活动。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发表《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一文,指出:“各厂工会必须高度重视这场运动,并认识这个运动是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的关键,是工会本身的中心任务。”^④总工会在宣传赵占魁先进事迹的同时,还号召边区工厂各工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规范科学的奖惩办法,采取多种方式组织边区群众参与到此次运动中来,争取在生产中涌现出更多劳动模范。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过程中,总工会及各级工会无论是在前期开会讨论、派遣干部深入实际,还是在组织竞赛、宣传和推广方面,均发挥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推动劳动模范选树工作顺利开展。

2. 自上而下设立各级生产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政府早期主要通过对生产模范的奖励与宣传,激发部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这一阶段尚未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运动。为稳定物资供给、实现生产自给并改善军民生活条件,1939年,边区政府号召全边区人民以及各级机关和部队工作人员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为此,全边区党政军学群众团体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生产委员会,总生产委员会作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动员全边区军民参与大生产运动。各级生产委员会下设五股,由五人至七人构成,其中组织股负责检查劳力,组织生产组班队等,并领导其生产。^⑤乡级及以下的生产委员会,主要任务为发动乡村群众参加与学习农林畜牧、工商、合作事业及乡村中其他建设工作。^⑥

为激发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生产委员会十分重视劳动模范的选树和奖励。1939年,李富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各部门在组建生产运动委员会时,应将奖励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对生产成绩突出的个人加以表彰。^⑦同年,边区党委在《关于加强生产运动领导的指示信》中,进一步就机关生产

①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03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4年,第189页。

③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7.7—1945.8)》,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第9-10页。

④ 《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第1版。

⑤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生产自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81页。

⑥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1994年,第295页。

⑦ 《加紧生产,坚持抗战——二月二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新华日报》,1939年4月18日,第4版。

运动作出部署,要求生产委员会和机关党支部通过组织个人之间、机关之间的竞赛,明确劳动纪律和奖励标准,在必要情况下“进行募捐慰劳在生产中的劳动英雄”^①。各级生产委员会在制定并落实生产计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劳模的组织与带动作用,广泛培育先进典型,激发生产热情,“完成生产突击计划”^②。随着生产运动的展开,边区陆续涌现出张治国、黄立德等劳动英雄,机关与群众广泛参与生产竞赛,各单位之间通过订立竞赛约定,“异口同声地高呼‘我们要做劳动的先锋’,‘我们要做劳动的英雄’,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各单位也都相互订立了友谊的生产竞赛条约”^③,争先恐后地准备开荒。

由此可见,劳动模范的选树有赖于政治权威加以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实现统一协调与规范推进。较为完备有力的组织结构,为劳动模范选树提供了广泛且可接受的政治环境,从而保障了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深入挖掘发现劳动典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典型的挖掘方式主要有实际调研访寻、劳动竞赛评比、群众投票选举等。其形成方式直接影响群众认同,也关系到典型示范作用及后续推广、奖励的实际效果。

1.进行实地调研访寻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基本方法。“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便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查,并将调查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成果,为各项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同样遵循这一工作方法。《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在边区舆论宣传中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新闻工作者,“站在群众之中,通过群众耳闻目见的活生生的事实之分析与理解”^⑤,并在其中充分发掘典型、宣传典型。为此,在1942年的春耕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为树立公众所一致认同的劳动模范,委派《解放日报》记者深入农村基层进行广泛调研。记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到了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⑥当时,吴满有是边区农村中最具影响力的劳动典型,是党经长时间调查、访寻发现的第一人。随即《解放日报》报道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并配发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响应。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不仅为劳动模范的挖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渠道,还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2.开展劳动竞赛评比

马克思曾指出:“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⑦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竞争能够激发人民斗志,提高社会生产率。苏区时期,中共中央曾发布《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通知,号召全党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广泛调动群众,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完成春耕,促进了革命各项事业的发展。^⑧

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危机日益加重。借鉴早期苏区革命竞赛经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发展边区生产力,仅依靠单纯的物质奖励难以奏效,必须通过发动群众竞赛形成生产热潮,抓住积极分子,培养一个在运动中堪为表率的人物。由此,群众性劳动竞赛被有意识地纳入劳动模范的发掘环节。1943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社论《生产大竞赛》,动员边区军民参与生产竞赛与评比活动。随后,各类劳动竞赛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劳动模范成为竞赛中的主要参照对象。以白源村为例,石明德被评选为劳动模范

①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1994年,第239页。

②《生产突击》,《新中华报》,1939年3月22日,第1版。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生产自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⑤《展开通讯员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第1版。

⑥莫艾:《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1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363页。

⑧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后，其事迹在周边村庄传播，多个村庄相继出现新的模范生产者，逐渐形成以竞赛和评比为主要形式的生产氛围。

3.组织群众投票选举

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劳动模范的评选方式、条件、范围等仍处于摸索阶段。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前，由于大生产运动还未广泛开展，部分领导对劳动模范不够重视，在劳动模范产生方式上，以自上而下的指派为主。^①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后，大部分领导干部已深刻认识到劳动模范的重要作用，边区群众也体会到当选劳动模范是无比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宣传劳动模范经验与事迹，发展边区各项事业，制定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对选举的标准、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并指出劳动模范必须从群众中选举产生。^②这就意味着，从劳动模范的产生方式来讲，已由上级指派转变成了民众投票选举。各地按照边区政府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不设阶级、文化程度、性别和民族限制的无记名投票。1944年边区政府再次颁布劳动模范选举办法，强调选举必须郑重准备。此后，很多地区在各行各业举行试选，劳动模范选举进入更为完备和科学的阶段。通过发动群众投票选举的方式，既体现了民主原则，避免了冒名顶替和权力干预，也提高了劳动模范选树的实际成效。同时，选举过程增强了群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扩大了劳动模范的社会影响，并在实践中促进群众参政意识的提升，加深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及边区政府的认同。

从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模范发掘的过程不难发现，劳动模范的确立经历了调查发现与群众认可的双重验证。吴满有、石明德等劳动模范典型，因其自身示范性与当时生产发展需要相互契合，其个体形象得以上升为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符号。这一挖掘过程为后续宣传与推广奠定了基础，使典型示范更具现实意义与长远效应。

（三）多渠道宣传劳动模范事迹

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和推广劳动模范过程中，采用了多种贴近实际的方式，扩大了劳动模范的社会影响，在边区逐步形成示范效应，其主要形式包括会议表彰、报刊报道以及文艺作品宣传等。

1.会议表彰奖励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挖掘劳动模范的基础上，组织召开劳动模范大会、群英大会、生产展览会等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会议，通过集中交流生产经验、展示劳动成果和举行表彰活动，逐步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劳动模范宣传与推广方式。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大会，这次大会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是“中国劳动人民空前荣典”的大会。^③大会主要内容为：各劳动模范代表总结和交流生产的经验与方法；制定下一年的计划和生产方案；组织劳动竞赛。与会的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均获得政府表彰与奖励。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后，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指出：“要听取参加延安大会回去代表的传达，把他们的传达，更广泛的传播到农村中去，把他们的传达，作为领导生产工作的重要参考。”^④此后，各地区按照上级指示，举行了不同级别的县、区劳动模范大会。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亦称“群英大会”，到会代表人数较第一届明显增加，达到其两倍之多。大会评选出了特等劳动模范74人、每人奖金8万元，甲等劳动模范200人、每人奖金5万元，乙等劳动模范189人、每人奖金3万元。毛泽东还发表讲演，充分肯定了劳动英雄的“三大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激发了全边区人民的劳动热情。

①贾颖：《塑造劳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经验（1939—1944）——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②《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其代表的选举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第1版。

③孙云、范译文：《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召开及历史意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④《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各县应做的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1月8日，第2版。

为加强宣传力度,更有效地动员群众,中国共产党还采取其他辅助办法——农工业展览会,通常与劳动模范大会同时召开。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共举办展览会74个。^①由于展览会反映边区真实生活,紧密配合生产与革命,吸引了众多参观者。1938年初,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参观人数达3527人^②,会上毛泽东还为工人模范颁发了奖状题词。1943年边区生产展览会20天时间内参观者高达五万人。该会主要目的是展示边区一年来生产建设方面的成就,以鼓舞人心,提振士气。陈列的展览品分为十大部门,从总展到分展共6596件展品,1987张生产过程的劳动照片及图表。^③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来讲,实物比大会报告更具有说服力,林伯渠指出:“边区生产展览会是一年来生产斗争的缩影,同时起着批评、指导及教育作用。”^④两次劳动模范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同时召开,在加强劳动模范宣传同时,借助展品使群众切实地感受到边区的建设与发展,巩固了党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2. 媒体报道推广

利用媒体宣传劳动模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受历史条件限制,报纸成为陕甘宁边区宣传劳动模范的主要媒介。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报刊对劳动模范进行宣传和推广。

《新中华报》作为当时党的机关报,对劳模的推广多以简要消息为主,侧重整体情况而非个体形象宣传。例如,1940年2月,该报在报道第二届工农展览会闭幕情况时提到,参展并获奖的展品数量达千余件,获得表彰的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者约三千人。^⑤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并成为新的中央机关报后,承担起更为全面的劳模宣传任务,推出具体典型人物的报道,如退伍军人周秀山、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以及妇女劳动模范郭风英等。据统计,仅1943年一年时间内,《解放日报》刊发与大生产运动相关内容达三千余篇,其中相当部分用于介绍生产实践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及其事迹。^⑥1944年1月至3月,《解放日报》特设大生产运动专栏,介绍劳模带领下的村庄或工厂的生产情况。这些典型报道以简明直接的方式呈现,既适应了边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也契合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有效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生产。在集中宣传劳模事迹的同时,《解放日报》还结合生产实际发表具有号召性的评论文章,如报道吴满有时,先后刊发了《吴满有——模范公民》《开展吴满有运动》等。以劳模典型为核心的宣传方式,营造了鲜明的示范氛围,对推动边区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群众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党委机关报,受《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的影响,特别注重对劳动模范典型及其事迹的报道,选树了赵占魁、申长林等典型形象,并对他们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详细总结。《边区群众报》为更好地达到宣传效果,擅长运用各种报道艺术。1943年12月《边区群众报》同时刊登了关于冯云鹏与吴满有的两篇报道,目的是让群众全面了解二者的劳动竞赛情况,激发群众的竞争意识。此外,还会利用正面与反面报道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宣传。一方面,通过正面宣传劳动模范事迹来激励群众;另一方面借助二流子以总结经验教训。《边区群众报》大部分集中于改造和教育二流子,鼓励其积极生产,如“衣食村11个二流子,完成了竞赛任务,后来就没有人再叫他们‘二流子’了”^⑦。《边区群众报》以生动有趣、贴近大众的宣传报道激励边区人民积极投身于生产实践,为边区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舆论和精神力量。

3. 文艺作品宣传

在劳动模范宣传中,民间文艺作品源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具有为群众喜爱和接受的优势,能够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解放区展览会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前言。

② 《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速写》,《新华日报》,1938年2月17日,第4版。

③ 《两大盛会隆重举行闭幕典礼 劳动英雄光荣受奖 廿天参观展览会者逾五万人》,《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9日,第1版。

④ 《边区生产展览会是一年来生产斗争的缩影》,《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3日,第1版。

⑤ 《第二届工农展览会已胜利闭幕》,《新中华报》,1940年2月21日,第3版。

⑥ 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⑦ 《同宜耀四区衣食村的班子,完成了竞赛条件,他们已经不是二流子了》,《边区群众报》,1943年7月4日,第2版。转引自田颂云:《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6页。

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时，引导群众关注并效仿劳动模范。抗日战争时期，文艺作品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既发挥了文艺的大众传播功能，也在实践中承担起动员与引导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作品是人民生活的产物，为此，“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①。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边区基层，创造出一大批以新人物、新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秧歌剧是边区人民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1943年2月9日，鲁艺秧歌队以妇女劳动模范马杏儿为原型，创作了《兄妹开荒》，受到了边区民众的一致赞扬。4月25日，《解放日报》开始连载秧歌剧《兄妹开荒》。自此，反映劳动模范事迹和生活的秧歌剧陆续出现，如：以改造二流子为主要内容的《刘二起家》，以劳动模范典型形象为创作原型的《动员起来》，以宣传劳动模范事迹为主要目的的《向吴满有看齐》《张治国》，等等。新的秧歌剧，“展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②，是满足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

歌曲和诗歌是边区宣传劳动模范事迹的文艺形式之一。从创作方式看，歌曲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具体劳动模范形象进行专门创作，如贺敬之作词的《种菜圣人黄立德歌》，在边区得到较为广泛的传唱；另一类则是借用民歌旧调填入新词，如《生产谣》，“学习吴满有，学习申长林，多生产呀为自己为边区”^③，展现了劳动模范的示范与动员作用。在诗歌创作方面，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以平实语言塑造了勤于劳动、重视生产的劳动模范形象，被认为是延安时期较早受到群众欢迎的新诗之一。与此同时，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参与宣传，创作了以劳动模范为题材的木刻作品，如夏风的《劳动英雄归来》等，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劳动模范形象。此外，年画、窗花等通俗美术形式亦被用于相关宣传，如年画《丰衣足食图》、窗花《得奖光荣》等，使劳动模范形象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多样的文艺作品，对劳动模范加以集中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生产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劳动模范示范效应有赖于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与推广。借助形象化的选树方式与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劳动模范形象得以广泛传播，为其发挥榜样作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选树的主要经验

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延安时期是一个物质和生活资源极度匮乏、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的特殊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并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关键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他们在克服边区经济困难、推动边区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这一时期劳动模范选树经验，对于在新时代培育、宣传劳动模范和弘扬劳模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党的领导是劳动模范选树的根本前提

劳动模范作为优秀生产者和时代引领者，在生产实践中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但其社会影响力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与系统运作。通过组织、宣传与制度保障的配合，并借助劳动模范在群众中的纽带作用，形成了“党—劳动模范—人民”的传递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党与劳动模范并非单向作用，而是在实践中相互呼应、彼此强化。

为提高生产效率、巩固边区政权，中国共产党提出树立劳动模范，以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始终存在，但若缺乏系统推广，难以形成广泛影响。党的领导使劳动模范选树工作得以有序推进，并在组织、宣传与奖励等方面发挥了关键引导作用。在组织层面，依托既有组织体系，于春耕等重要时段召开各级劳动模范大会，集中表彰先进；在宣传层面，通过《解放日报》等党报，对劳动模范事迹进行持续报道；在奖励层面，在给予物质激励的同时，授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选任部分劳动模范担任基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861页。

^②《秧歌剧的形式》，《解放日报》，1944年6月28日，第4版。

^③《生产谣》，《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1日，第4版。

层干部，并辅以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

总体而言，党的领导是劳动模范选树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负责引导与组织，劳动模范发挥示范与号召作用，二者相互配合，推动了劳动模范选树工作的有效落实。

（二）群众路线是劳动模范选树的基本方法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普通民众始终作为皇权统治下的“愚民”，是中央集权的牺牲品。而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众是有要求、有思想、能动的人群”^①，将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醒认识到组织群众、发挥其力量的必要性，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②。

从根本上看，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选树是一场以群众为出发点、依靠群众力量推进的社会实践。一方面，“经济要求是民众自己最直接、最容易感觉得到的要求”^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条件困苦，各项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加之，陕甘宁边区以小农经济为主，政府需要大批群众领袖来领导和管理群众。为此，政府开展劳动模范选树工作，从群众中挖掘、培育及推广生产中的优秀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与粮食问题，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劳动模范选树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从劳动模范选举、劳动竞赛到劳动模范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人民的支持与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从群众中产生，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需求；同时，劳动模范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密切相关，是党的宣传员和人民的传声筒，生动地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宣传与教育相结合是劳动模范选树的有效手段

中国共产党在选树劳动模范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宣传推广，还重视对劳动模范的教育和提高。在边区有意识地教育和引导下，劳动模范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及时将党的方针政策传递给群众，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组织与协调能力，同时将基层群众的意见反馈至上级政府。

在劳动模范教育方面，边区主要形成了两种典型做法。一种是以马家沟村为例的读报组形式。读报组“是发扬民主、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和学习文化的极有力的武器”^④。通过读报组，劳动模范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政治觉悟与文化素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一种是以王家坪村为例的领导教育形式。王家坪村是模范村，它的主要特点是“乡党政——乡长、村主任、县劳动英雄是有领导的”^⑤，他们构成一个领导核心，先由他们商议决策，后召开党员大会，而后召开村民大会。这样一来，经过层层教育，劳动模范提高了自身素质，从而扩大了模范村的影响力。实践表明，若仅强调对劳动模范的宣传而忽视教育引导，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问题。因此，将宣传推广与教育提升相结合，成为劳动模范选树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四）弘扬劳模精神是劳动模范选树的价值旨归

劳模精神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人民共同培育的群体精神。^⑥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内外双重压力，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主动挑起生产重任，宣传生产经验与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在各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带头作用，创造并培育了伟大的劳模精神，使“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这一新的劳动观念深入人心，从而推动了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0-201页。

④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⑤ 《劳动英雄的教育与提高》，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242。转引自王彩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运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⑥ 李五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运动和劳动模范精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⑦ 荆蕙兰、贾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评析》，《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3期。

“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①劳动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劳动模范身上所彰显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始终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也是当下社会发展所需求的精神导向。“必须大力弘扬劳动模范精神，发挥劳动模范作用”^②，这一论断揭示了劳模精神能够超越具体历史情境而持续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弘扬劳模精神构成劳动模范选树工作的价值归宿。劳模精神的弘扬，有助于在社会成员之间凝聚较为稳定的劳动价值共识，使劳动在社会评价体系中不再仅仅体现为获取物质报酬的手段，而是被纳入社会认同与道德判断的范畴之中，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观念由实践层面向制度层面的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而，劳动模范选树的深层含意，并不止于表彰先进个体，而在于通过典型示范与精神引导，塑造社会成员对劳动价值的基本理解与认同。

劳动模范作为各领域的先进代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培育与宣传下，既为边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实践中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回顾并总结这一时期劳动模范选树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好发挥劳动模范的示范引导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Main Experiences of Model Workers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IA Ying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order to mobilize production and improve social mor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select and promote model worker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in-depth investigations, labor competitions, and mass-based nomination procedures, the Party and the border-region government gradually identified model workers within production practice. These figures were further widely recognized through meetings,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aganda, giving rise to a distinctive mechanism for the selection of model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this process, several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were accumulated, including adherence to Party leadershi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ity with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These experiences provide valuabl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model worker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l workers; exemplary shaping; social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 如初]

①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第2版。

②本报评论员：《必须大力弘扬劳动模范精神、发挥劳动模范作用》，《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